

晚清至五四祭悼文学 及其文化转型研究

李 国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晚清至五四祭悼文学 及其文化转型研究

李 国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武丛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至五四祭悼文学及其文化转型研究/李国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01-019319-9

I. ①晚…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②文化史-
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I206.5②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8186 号

晚清至五四祭悼文学及其文化转型研究

WANQING ZHI WUSI JIDAO WENXUE JIQI WENHUA ZHUANXING YANJIU

李 国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25

字数:210 千字

ISBN 978-7-01-019319-9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祭悼文学的溯本逐源	31
第一节 生死一线牵的文学再现	32
一、灵魂存在与祭悼文学创作	32
二、祭悼与“个体—群体”心理的互动结构	36
三、传统祭悼文学的流变	40
第二节 现代意念关注下的祭悼文学	46
一、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中式葬礼及其汉文祭悼小说	46
二、“社会”的发现——“世风”成为被审视与批判的对象	52
三、遗嘱与祭悼文——生死两界的“宣言”	59
第二章 国殇——革命背景下的政治与祭悼	64
第一节 祭悼情怀与革命气节的对话	65
一、为了今天的记忆——革命小说中的“香火”传递	65
二、亡魂与英雄的密谋——乌托邦境域中的同志情结	73
三、去异族化：种族主义视域中的祭悼观纠结	83
第二节 不“和谐”的节拍：反迷信运动中的“反祭悼”	91

一、反迷信运动：晚清维新的主潮流	91
二、文明小景：“反祭悼”背后的现代进步观	95
第三节 从“反祭悼”到“返祭悼”：落日夕阳下的近代 国家祭悼	102
一、循旧求新——近代祭天、祀孔大典的时代意义	103
二、革命遗愿与政治资源——祭悼孙中山背后的争斗	116
第四节 心态的涌动与秩序的维护——清末民初祭孔文化 考略	126
一、“常”与“变”——孔教会与祭孔活动	127
二、“退”与“进”——基督传教士与祭孔礼仪	132
三、“取”与“舍”——地方乡绅与祭孔活动	137
第三章 情殇——人鬼异界情缘的再续	144
第一节 “忆语”文体创作与祭悼情感救赎	145
一、“忆语”文体创作概述	145
二、《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与《伤逝》：悼情的 救赎	150
第二节 黄泉相见——曲终人不散的爱情乌托邦	157
一、爱情乌托邦——祭悼文学创作的主旋律	157
二、鬼域世界——爱情的异界延续	163
第三节 向死而生——五四知识分子的情感焦虑	167
一、五四涅槃——佛经神话与原罪救赎的杂交	167
二、对陋习的批判——五四乡土小说的祭悼叙事	172
第四章 道殇——新旧文化的对峙与交融	177
第一节 突变与潜变——对传统祭悼礼俗的反思	178

一、复古求变与异邦求新的抉择·····	178
二、知识交锋与文化重建——新文化运动对祭悼习俗的 批判与改革·····	183
第二节 现代性视域下的无神论思想·····	188
一、从有神到无神——一场知识谱系上的话语争夺战·····	188
二、科学与玄学——五四人生观信仰大讨论·····	195
第三节 信仰沦落与精神物语的纠结·····	201
一、“灵魂救国”——《灵学丛志》与《新青年》的 对战·····	201
二、管中窥豹——挽联中的文化“祭”语·····	206
三、捐躯殒命——殉道者文化信仰的坚守·····	209
第四节 鲁迅的祭悼观及其文学创作·····	214
一、祭悼文化与鲁迅文学创作研究的可能性·····	214
二、鲁迅祭悼观的建构及其价值·····	219
三、祭悼文化在鲁迅写作中的表征与意义·····	224
结 语·····	232
参考文献·····	239
后 记·····	252

导 论

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风，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

——刘勰《文心雕龙·祝盟第十》^①

有人与神与天相接之礼，则祭礼是。故曰：“礼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情也。”（礼记·礼运）诸礼之中，惟祭尤重。盖礼之所以能范围群伦，实植本于宗教思想，故祭礼又为诸礼总持焉。

——梁启超：《国史研究六篇》^②

甲子乙丑丙寅年，道光手里出洋烟，鸦片烟来生的怪，生在阳间把人害。鸦片烟是乌黑的，单单害的年轻的，抽得浑身没肉了，抽得耳朵干扭了，好人抽成病人了，活人抽成死人了。死了别给我戴帽子，给我买一副灯罩子，死了别给我穿衣帽，给我买一个过瘾套，死了别给我穿衫子，给我买一副烟杆子，死了别给我穿裤子，给我买一副葫芦子，死了别给我蹬靴子，给我买一副烧烟灯。

——《中国歌谣集成》甘肃卷^③

① 刘勰：《文心雕龙·祝盟第十》，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75—176页。

② 梁启超：《国史研究六篇》，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341页。

③ 《中国歌谣集成》（甘肃卷），见田涛著《百年记忆：民谣里的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146页。

清末至五四落潮这一时间段，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频繁接触、对抗与交融的时期，也就形成了一个“常”与“变”、“退”与“进”、“取”与“舍”的文化交锋与转型语境，中国文学亦随之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的现代转型新特征。在文学“标新”的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便是祭悼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格局下生成的价值功效、情感释放、生死体验与文学叙事。祭悼是儒道礼俗中最根本的所在，在“政教”与“风化”的实施中，维系了权力/伦理/秩序系统的稳定。它连通了生与死的玄关，实现了阳间与阴间两个空间的情感沟通，不仅是一次与死者告别的仪式，给生者以情感慰藉与心理寄托，更承担着清算和规范社会伦理与秩序的责任。然而正是这一“祭悼传统”，自晚清以来遭遇了西方文化冲击与本土时局突变后发生了种种变化，形成了斑斓多姿的新景观，同时也构建了一种中西文化审视祭悼传统的对话空间。因此，如何审视“祭悼传统”的变化，进行“个体/群体”间的伦理道德、生死观照、心灵慰藉、生命体验、生活文化等诸种场域的梳理，便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灵动的祭悼文学及其文化的“再构”话题。

祭悼文学不仅包括最基本的祭文或悼文等实用文体类文章，更具文学价值的则应指涉那些以缅怀为基本主调，蕴含“慎终追远”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思考，并以语言艺术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与生死感悟，特别是呈现日常生活的祭悼文化心理审视的文学创作。其中，展示民族国家的时代内涵，揭示世风变革下个人和群体的命运，表现情爱旖旎的深层体验，以及挖掘新旧并存的文化纷争的作品，占有十分重要而醒目的位置。其所关涉的祭悼对象博杂多样：既有天地神灵等权威象征，又有血脉人伦等亲情对象；既有日月星辰等天体现象，又有山川风雨等自然景观；既有对动物植物的祭悼，又有对人类物品的祭悼；既有虚妄的神灵祭悼，又有现实的人类祭悼。祭悼文学不单纯是一种文字符码化的表现，更是人精神世界与心理沉淀的折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至真、

至亲、至善与死亡面前，它也许是最真实的情感流露与人文表征。同时，祭悼文学又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情感艺术表达，它同样呈现出了生死观的顿悟、弥留之际的心态、阴阳两界的爱情延续，以及儒道伦理规范的恪守等多样特征，是殉国、殉情、殉道三种时代话语的本真记录。所以，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祭悼文学及其文化转型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祭悼“应该这样”的理想建构，而这一建构事实上寄托着他们对国家强大和民族昌盛的现代化渴望，以及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内心焦虑与情感宣泄。可以说，祭悼文学以异于旧时代的时代命题与异质旋律奏响了动人的乐章。祭悼哀情不仅贯穿于整个文本当中，极力凸显出了时代命题，同时也可以是在隐藏在文本当中，构成故事叙事的情感基调与背景衬托。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书意在探讨清末至五四现代性语境中的祭悼文学及其文化转型问题。在这一问题的框定下，祭悼本身不是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是作为切入文学研究的一个手段，以此尝试挖掘出近现代文学进程中的“国殇”、“情殇”与“道殇”三个时代命题。具体表现为文学意义上的对国家的祭祀、对爱国烈士的公祭、对文化先贤的祭奠、对亡者的悼念以及在祭悼仪式的变更中所呈现出来的“个体/群体”、“古/今”、“中/西”不同的悼情体验与生命感悟。所以，本书从祭悼文学传统源流及本土化文化构建、祭悼情感救赎与乡土祭悼叙事、西方祭悼观对传统的冲击与再构以及民族国家主义与话语等几个方面来阐释中国文学现代语境下的祭悼文学及其文化转型的构建过程：

首先，对祭悼文学进行简要的溯本逐源式梳理。从对待死亡的态度开始，阐释传统的祭悼观念，并以“个体—群体”的社会心理学内容继续深化这种祭悼观念的生成，进而述说如何形成文学意义上的想象存在，这包括传统的祭悼文学模式流变、现代祭悼文学关注下的“世风”转变与“社会”的被发现。其次，在“国殇”命题之下，揭露革命高涨中的祭悼观念如何以文学文本呈现出来以及如何体现出其特有的社会

意义，同时在科学/政治的对视视角中揭示出“反祭悼”/“返祭悼”的不同取向与文学再造；对当时隆重而庄严的祭孔活动进行必要的文化考究。再次，从“情殇”角度切入，通过具体的文本与相关祭文，分析清末至五四现代转型期间的祭悼情感体验，包含爱情乌托邦的以及五四涅槃情结等祭悼心理体。最后，站在“道殇”立场上，将研究视角延伸到五四时期，以本土/西方互为参照的对比来详细论述二者在文化/文学层面上的彼此建构，发掘在无神论宣扬下的鬼神观与祭悼观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传统文化式微下捐躯殒命的殉道文化人的献祭精神与信仰坚守；梳理西方知识话语影响下的作家们如何实现自我的祭悼观念书写；而祭悼文化与鲁迅文学创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则作为个案加以细致分析。

一、祭悼进入文学研究的价值

从鸦片战争开始，尤其是戊戌变法到五四落潮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在“被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开始了由古典走向现代的身份转变。从思想文化史来看，在近代发生的传统与西方二者激烈对峙交锋的背后，这种转型体现着一种知识与文化急剧转变的事实。正如费正清所说：“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1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分水岭，1898年的改良运动，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制度变革上的一次尝试。它开始是作为1895年被日本人在军事上打败的一种反应，但却以摒弃传统的中国中心世界和大规模吸收西方‘新学’的努力而结束……1898年改革的锐利锋刃已直接指向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其标志的彻底的‘新文化’思想运动，也被看成是传统道德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攻击。”^①可以说，戊戌维新的政治努力虽然失败了，然而其附带而来的知识与文化变革深

① [美] 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页。

深影响了中国未来几年的思想文化界，并掀起了一种世界观与价值观根本性改造的狂热浪潮，为五四先驱者反抗传统文化与礼俗的彻底爆发提供了知识储备与文化参照。美国学者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也认为：“如果把1910年中国的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的、以至今天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这个观点得到国内不少学者的认可。^① 这一“明显地彼此脱离”恰如费正清先生所说的“分水岭”，是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鲜明判断。可以说，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果从知识与文化本身的根本转变来考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文学和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种学科之间的并发共生性。然而，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它们以何种方式黏在一起呢？这种相互黏合的背后又呈现出了怎样的互动关系？如果从互为因果的关系切入，各学科现代转型萌生的文化迹象将会对文学现代转型起到什么样或者多大程度的干预作用？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对拓宽文学研究视野、丰富文学现代转型的面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正如陈平原先生在其具有开拓意义的博士论文中所说，1898年到1927年这30年虽然短暂，但其承担的历史重任——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而言，研究十分重要，可以从文体学、类型学、主题学、叙事学等诸多角度综合把握。^②

① 任达书名为 *The Xin 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中译本名为《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该观点见中译本第215页。对于此书，国内学者多有关注。如桑兵曾著文《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中国，1898—1912：新政革命与日本〉》（《燕京学报》新4期，1998年）专门做过评论；而对于任达的观点，桑兵在《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总序中引用过并进而对近代各学科的现代转型做过详细阐释。

②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那么,本书为何选取“祭悼”这一主题呢?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是“祭悼”不仅是上述各学科交叉内容,同时祭悼文学书写在古典文学史中是一个极其丰富的存在,其特有的文化观念与心理体验无不鲜明地呈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及至近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却成了一种“断裂”的存在。因此,十分有必要探讨导致这种“缺失”现象发生的原因,并为其争取文学史叙事的一席之地。毕竟,一方面,文学史的构成绝不仅仅是政治的附庸与史料的堆积,文学思潮的精神演进更是文学史摆脱不了的关键所在。这即如勃兰兑斯将文学史当作心灵史看待那样,“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①所以,文学史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发展史,而从祭悼心理的现代变动入手来寻求现代文学的心灵史建构便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视角之一。另一方面,从文化视角来看,儒家思想的关键因素是“礼”,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之所在。正如钱穆先生在台北接待美国学者时所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②李学勤也曾说过,“礼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如果忽略了其中的宗教崇拜及有关的思想观念,于传统文化便不能有全面的理解。”^③而在“礼”的精髓中,祭悼文化又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规范社会秩序与现实人生的重要手段。所以,梁启超在分析中国儒礼文化之后总结说:“诸礼之中,惟祭尤重。盖礼之所以能范围群伦,实植本于宗教思想,故祭礼又为诸礼总持焉。”^④也正因为处在

① [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② [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③ 见李学勤为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作的“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另外,李学勤在《中国礼文化》(邹昌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的序言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④ 梁启超:《国史研究六篇》,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341页。

“诸礼总持”的位置上，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祭悼题材的文学书写就未曾离开过人们的视野。在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中，就出现了诸如《清庙》、《维天之命》、《烈祖》等多篇关于祭悼题材的诗歌；《九歌》是民间祭神的乐歌，《国殇》是祭悼和颂赞为楚国而战死的将士；《礼记》中有专门的《祭法》、《祭统》等典章制度；《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第三”、“祝盟第十”等章节中有专门的关于祭悼文学的文体归类；《昭明文选》中有专门的关于祭悼的文章选录；而更为显著的是古典文学史中那些涉及祭祀丧悼方面的散文、诗词、戏剧、小说等体裁创作可谓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然而，从文学史撰写的角度来看，祭悼文学的关注与总结何以到了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成为一种“悬置”的内容而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

显然，启蒙、改良、革命、保国、科学、民主等众多时代主题与现代命题在近现代思想文化领域中处在显学的重要地位上，已然掩盖了传统祭悼文学的光辉。因此，只有将祭悼文学置放在一个现代转型的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才能够更好地发掘出祭悼文学及其文化再构所彰显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所以，就其时间段来说，本书采用当前学界中一个逐步深化并得到统一的共识，即将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这一时段的文学发展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初始阶段。无论从文学的生产体制、消费模式、传播流通等外部环境，还是文学的雅俗观念、功用价值、文体变化、人物塑造等内部因素来看，其所体现出来的新的思维模式与精神维度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均有着迥异于传统创作的深远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海外学者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疑起，现代文学转型于晚清的论证就没有停息过。李欧梵、章培恒、范伯群、朱德发、陈平原、王铁仙、孔范今、栾梅健等诸多学者都有类似的断论。如王铁仙认为，“中国文学的转型并不是从‘五四’突然开始的，在1898年至‘五四’前，在一些

文学文本内，从内容到形式都已含有一些现代性因素……，这个时期只能说是现代转型的‘准备’阶段，或如梁启超所说的‘过渡阶段’，只有到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才开始转型。”^①而孔范今先生从文化启蒙角度亦指出，“以戊戌变法失败为契机所引发的梁启超式的反思及其迥异于前的历史性行为，表征着历史由政治变革转向文化启蒙的深刻变化。它虽然只是发生于两次政治变革的历史空档中难以持久，但却有幸成了20世纪文化启蒙的开端，梁氏的文化批判及其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积极倡导，已揭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所关注的诸多基本命题，并以其在新历史层面上的整合，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②栾梅健更从都市意象、人物设置、新式器物、主题旨意等方面认定发表于1892年的韩庆邦的小说《海上花列传》应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③可以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意图以政治革命改变时政的同时，严复、梁启超等人就意识到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等诸种“新民”之举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发力所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改造国民精神与风貌的民主与科学努力则成了文化启蒙的根本内容。在这种忧患与期望并存的时代环境中，清末民初出现的一系列文学变革与转型，似利器般划破旧有范式，积极响应着这场文化启蒙运动；到“五四”以道德、伦理、科学等内容为变革要求的新文学革命与新文化革命的彻底爆发，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所以，将祭悼文学作“穿针引线”之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形成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连贯性，使“五四”这一时期在文学史的地位显得并不是那么断裂突兀，既能展现出既往传

① 王铁仙：《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② 孔范今：《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文史哲》2000年第2期。

③ 栾梅健：《1892：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论〈海上花列传〉的断代价值》，《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统文化积淀在此时期的变更，又可突破对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异变的意识形态视角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寻求二者之间文化观念上的承接。

如何界定祭悼文学？大体而言，它不仅包括最基本的祭文或悼文等实用文体类文章，更具文学价值的则应指涉那些以缅怀为基本主调，蕴含“阴阳异界”的生命延续，并以语言艺术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与生死感悟，特别是呈现日常生活的祭悼文化心理审视的文学创作。其中，展示民族国家的时代内涵，揭示世风变革下个人和群体的命运，表现情爱旖旎的深层体验，以及挖掘新旧并存的文化纷争的作品，占有十分重要而醒目的位置。其所关涉的祭悼对象博杂多样，既有天地神灵等权威象征，又有血脉人伦等亲情对象；既有日月星辰等天体现象，又有山川风雨等自然景观；既有对动物植物的祭悼，又有对人类物品的祭悼；既有虚妄的神灵祭悼，又有现实的人类祭悼。所以，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祭悼文学以异于旧时代的时代命题与异质旋律奏响了动人的乐章。祭悼哀情不仅贯穿于整个文本当中，极力凸显出时代命题，同时也隐藏在文本当中，构成故事叙事的情感基调与背景衬托。而且，祭悼文学又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情感艺术表达，它同样呈现出了生死观的顿悟、弥留之际的心态，以及群体伦理规范的恪守，是殉国、殉情、殉道三种时代话语的本真记录。所以说，这种文化学意义上的观照让祭悼文学不单纯是一种文字符号化的表现，更是人精神世界与心理沉淀的折射，在至真、至亲、至善与死亡面前也许是最真实的一种人文迹象。

对生者来说，肉体的死亡并不意味人的最终死亡。所以，祭悼是联结生死两界的行为仪式，需要完成它最终的社会意义。同时，它又是人类的一种心理情感体验，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思想中都可找到关注祭悼的言论。它涉及活人对死亡现象及相关问题的思考与呈现。一方面，它离不开以信仰为核心的观念体系（如灵魂观念、阴阳两界、生命轮回等），另一方面，又与风俗、仪式等为表现形式的行为特征（如丧葬、

招魂、驱鬼、祭祖、祭天)等相联系。可以说,前者是一种抽象的深层思维表达,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化行为呈现,祭悼背后有着灵魂不死的原始信仰、慎终追远的儒家伦理、六道轮回的佛教教义、赶鬼驱邪的道教仪式等丰富内容。在这种相互之间交融一体的黏合状态中,祭悼文化便成为围绕死亡事件与死亡活动而形成的思想文化体系,其所囊括的诸如小说、戏剧、音乐、舞蹈、绘画、歌谣、俗语等,都必将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因此,本书所要解决的是文学视角下的现代性语境中,祭悼文学样式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祭悼文化是如何展现出其特有的现代性特质的。毕竟,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主要不是一种已然的经验性的叙事,而是一个需要实现的目标,对于‘现代性’的想象以及渴盼社会迅速‘现代化’的理性构想和情感诉求,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中心内容”。^①而且,“占据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文化价值、精神信仰层面的变革。也就是说一切变革都需从哲学/信仰层面发动而外推之其他”。^②所以,在这种功利性的现代诉求中,如果对祭悼的现象学与社会学等文化内容加以分析,将文学研究放置在“社会学—现象学”的文化阐释性结构中,便可形成一种揭示现代转型期间的祭悼文学的文化意义生成与流变的可能性。

正因为如此,祭悼观念及其所呈现出来的文学想象才会在这种转型的氛围中显得尤为重要。从本质上来说,祭悼不仅是一种个体心理特征的体现,更是一种社会群体心理变相折射。祭悼文学这种古老的文体在近代通过与现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群体意识、国家理念、启蒙思潮、民族主义等内容的相互融合,已然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生态势,其展

① 耿传明:《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3页。

② 耿传明:《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